

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研究

潘明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研究

潘明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研究 / 潘明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203 - 0503 - 7

I. ①先… II. ①潘…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先秦
时代 IV. ①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405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顾世宝
责任校对 张 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39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及基本资料	(5)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12)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3)
第二章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夏代都邑	(28)
第一节 夏代都邑概况	(29)
第二节 夏代都邑体系推测	(38)
第三节 本章小结	(40)
第三章 商代的都城迁移与多都并存制度	(41)
第一节 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	(41)
第二节 仲丁迁隰至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中期 都城的迁移	(60)
第三节 晚商的多都并存现象	(7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90)
第四章 西周时期的都城设置与多都并存制度	(92)
第一节 岐周、宗周、成周的都城设置	(94)
第二节 西周前期岐周、宗周、成周的都城关系	(104)
第三节 西周中后期都城地位的变化	(122)
第四节 关于葬京和王城的思考	(129)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42)
第五章 晋国的多都并存制度	(143)
第一节 翼、绛与唐的关系——西周时期晋的都城设置 ...	(144)
第二节 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晚期曲沃与绛的关系	(154)
第三节 新田与绛、曲沃的关系	(15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62)
第六章 秦的圣都和都城体系	(164)
第一节 秦都城概述	(164)
第二节 秦的圣都及其地位	(183)
第三节 秦圣都与俗都的关系	(19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93)
第七章 楚国的多都并存与都城体系	(196)
第一节 楚国都城概貌	(196)
第二节 楚国始都丹阳	(198)
第三节 楚国都郢时期的多都并存	(205)
第四节 楚弃郢之后的国都	(221)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24)
第八章 齐国的五都制	(227)
第一节 营丘—薄姑—临淄	(227)
第二节 春秋末年战国时期齐国的五都制	(230)
第三节 齐设五都的原因思考	(23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40)
第九章 燕国的多都并存制度	(242)
第一节 西周时期的燕都	(242)
第二节 燕都薊城	(246)
第三节 燕桓侯时迁都临易	(250)

第四节 燕文公时建都易	(252)
第五节 上都蓟城与下都武阳的都城关系	(254)
第六节 本章小结	(260)
第十章 战国时期都城制度的异变	
——以赵的一都独大现象为例	(261)
第一节 赵的一都独大现象	(261)
第二节 一都独大出现的原因	(264)
第十一章 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271)
第一节 多都并存制度的滥觞时期——夏商	(272)
第二节 多都并存制度的确定时期——西周	(273)
第三节 多都并存制度的发展时期——春秋战国	(275)
第十二章 先秦多都并存制度形成的原因	(286)
第一节 都城功能分散导致多都并存	(286)
第二节 空间权衡导致多都并存	(292)
第三节 文化、制度的传承导致多都并存	(301)
第四节 社会控制能力对都城体系的影响	(311)
第十三章 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影响	(318)
第一节 秦汉以后多都并存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实际上的一都独大与形式上的多都并存	(318)
第二节 先秦都城设置形式对后世都城设置的影响	(325)
第三节 先秦都城制度对城市形态和城市结构的影响	(327)
参考文献	(331)
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代后记）	(346)

第一章

绪论

都城作为一个国家或政权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中心，是历史横断面的缩影。都城是承载国家政治权力中枢功能的一个区域政治实体，研究古代都城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及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主要都城之外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同时存在的多座都城来有效统治疆域、强化政治管理的政治制度，可以称为多都并存制度。多都并存制度是我国古代建都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应用非常广泛，几乎各个统一王朝及大部分割据政权都设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都城。先秦时期是多都并存制度的形成时期，同一王朝或政权的多个都城的设置情况及设置背景、都城的政治地位及都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先秦多都并存制度对后世的都城体系、城市形态和城市结构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影响。本研究旨在以先秦时期同一王朝或政权的多座都城设置为研究对象，还原其历史真相，揭示其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先秦时期是我国多都并存制度形成的时期，因此，研究先秦的多都并存制度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 古代都城研究的重要性

都城是国家统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都城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因此,可以说都城是一个政权最重要的城市,都城的地址选择、数量设置、都城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等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在中国古代,都城更是占据着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它往往与政权的兴衰存亡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刘庆柱所言:“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是集中体现物化载体的国家政权形式,因此,一般而言都城的兴废与国家政权的建立、灭亡同步。古代王朝建立的第一行动和标志,往往是‘定都’,而都城被攻陷、覆灭则意味着王朝的终结。”^①

从都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历经几千年的政治变革和数十次的朝代变更,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变革与变更都伴随着都城的变迁。都城的区位选择总是以特定的社会背景为前提,以特定政权的政治要求和政治目标为基础,都城的数量设置及都城与其他城市、其他地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是必须深思熟虑的。这中间包含着深刻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考量。

由于都城是特殊的城市,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都城,对历史时期其他城市的研究也有很大启发。

都城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科学研究历来强调“学以致用”和“学以致道”,“学以致道”在于揭示所研究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体现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学以致用”则是为现实服务,体现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从“学以致道”的角度来看,古代都城是历史地理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研究古代都城体系及都城的发展规律又是古代都城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对古代都城体系的深入研究,可以扩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和发展历史地理学理论。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来看,都城的区位、都城的数量设置、都城政治地位的升降、都城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关系、都城的腹地大小等都是一个政权是否能够站稳脚跟、致力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因此,研究古代都城可以以史为鉴,为现实的都城城市发展、都城区域发展和全国各区域和谐发展服务。

^①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7期。

二 古代多都并存制度研究的重要性

多都并存是我国古代都城制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是一个政权或王朝在国都之外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控制力的政治制度。

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在区域空间权衡理念的支配下，许多王朝或政权除了设置首都（或称为“主都”）以外，还设置一些辅助性都城，亦即陪都（或称为“别都”），从而形成同一政权同一时期有多座都城并存的局面，基本构成由一座主都与若干陪都所组成的复杂都城体系。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建置史的一个特点。

多都并存的现象起源甚早，在中国都城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存在，其本身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特征。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几乎大部分王朝或政权都采用多都并存制度。虽然历朝设置都城的形式、数量、原因、都城之间的关系等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认，广泛而普遍存在的多都并存制度对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陪都对其所辅助的主要都城发挥了支持作用。因此，多都并存制度的研究应该成为我国古代都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先秦时期多都并存制度研究的重要性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大部分政治制度的形成时期，也是多都并存制度的起始时期。

三代时期每个政权有多座都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史念海先生综述过三代的都城：夏的都城先后有崇、安邑、平阳、晋阳、阳城、阳翟、黄太之丘、斟鄩、帝丘、斟灌、原、老、西河等13处。商的都城，自契至汤八迁，实有亳、蕃、砥石、商、商丘、相土之东都和邶等7处。汤以后6座都城，为囂、相、耿、庇、奄、殷。早周有郕、豳、岐、程、丰5处。三代共有三十多处都城。^①但是，这些都城是同时存

^① 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在的关系还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其政治地位怎样，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并存的都城如何设置，其相互关系如何等问题也需要在复原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其设置原因，探究其政治地位的演变和相互关系的动态变化。

关于夏商都城，文献记载较为模糊混乱，在梳理文献之外，需要借助考古资料论证分析。

多都并存制度的起源，从明确的文献记载来看，应是从西周时期开始的，这一时期，青铜铭文出现有“周”“宗周”“成周”之名，文献记载中也有洛邑被称为“新都”（与之相对的都城应为“旧都”）、“东都”（与之相对的都城应为“西都”）的说法。但是，制度的确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成文记载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了多都并存制度的存在与演变，发展到西周时期，这个制度才被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文献明确记载下来。由于学者对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多都并存制度的起源成为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政权多座都城同时存在的制度普遍盛行起来，相关的文献记载也多了起来。例如，《左传》中，晋国的曲沃被称为“下国”，也就是地位次于国都的“国”；楚国在陈、蔡、不羹三县筑城，“赋皆千乘”，称为“三国”；齐国也有设五都的制度，据《战国策·燕策一》所载，齐国除国都临淄外，还在四境设有四个别都，因此，当时有“五都”的说法；《战国策》中，燕国也出现“下都”武阳的名称，当然也会有对应的“上都”。因此，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复原各诸侯国的都城设置及都城地位状况是必要的。

多都并存制度起源甚早，这是大部分学者公认的。但其具体起源的时期，学术界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远在夏代即已出现^①，只是有关夏代的主都和陪都，在考古学上还未得到确认。还有学者认为，“早商时代，偃师商城可以说一直是商都的别都（即陪都或离宫）”^②，或者提出

①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李民：《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程平山：《夏商周历史与考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② 邹衡：《桐宫再考辨——与王立新、林沄两位先生商榷》，《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郑州商城（即阌或管）是商代前期的别都，而朝歌（即牧或沫）是商代晚期的别都^①，则说明至迟在商代前期已经出现了主都、陪都并存的都城形式。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陪都是西周初经营的雒邑^②。由此可见，学界对多都并存制度起源于何时的具体观点差异甚大，基本集中在夏、商、西周三个时期。只有全面分析夏、商、西周时期的都城设置情况，才能确定多都并存制度起源的具体时代。

多都并存是先秦时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逐渐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制度，这个制度对后世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秦汉以后的多都并存制度，在设置形式、都城数量甚至都城关系等方面都与先秦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先秦时期不仅是我国都城制度的形成时期，也是多都并存制度起源并定型的时期。所以，研究先秦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对认识我国古代都城制度、深刻了解我国相关政治制度，进而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等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及基本资料

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研究是一个比较难做的题目。从笔者对已有研究成果的信息检索来看，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也比较零散，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

一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由于对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研究没有可直接参考的研究成果，我们将视野转向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方面，希望这些成果对本书的研究能有一定的帮助。

（一）对古代都城的研究

在我国，都城历来是一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最集中的表现。

①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9页。

② 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八辑，中国书店1993年版；朱士光、叶晓军：《试论我国历史上古都的形成与作用》，载《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赵中枢：《古都与陪都》，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八辑，中国书店1993年版。

因此,对于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是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城市史的重要课题,长期受到历史地理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在对我国古代都城的研究方面,出版、发表了一批专著、论文。

对古代都城的研究,有通史性质的著述。如史念海先生的《中国古都与文化》^①对古都的内涵、古都形成的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总结与探讨。李洁萍《中国历代都城》^②、吴松弟《中国古代都城》^③等均介绍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概况。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④是研究古代城市地理的一部专著,涉及古代的大部分都城的形状、规模、平面布局等。此外,叶骁军《中国都城研究文献索引》^⑤及《中国都城历史图录》1—3集^⑥为研究都城做了资料和图片的整理工作。

古代都城研究中,断代性质的著述也不少。如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⑦分析先秦文献记载,讨论诸多都城的地望与平面布局,为本研究提供了先秦都城的资料。徐卫民《秦都城研究》^⑧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九座都城,探讨了秦国都城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为本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研究思路和秦国都城的研究资料。

港台及国外学者也注意到都城研究领域大有可为,如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⑨对中国古代城市和都城尤其是北京和南京给予了特别关注,谢敏聪《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再研究(1403—1911)》^⑩研究了特定的都城——北京。日本学者也开始进行中国古代都城的比较研究,主

① 史念海:《中国古都与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② 李洁萍:《中国历代都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吴松弟:《中国古代都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④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 叶骁军:《中国都城研究文献索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⑥ 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兰州大学出版社,第一集出版于1986年5月,第二集出版于1986年12月,第三集出版于1987年6月。

⑦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曲英杰另一本著作《史记都城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以《史记》所载的历代都城为线索,大部分研究也属于先秦都城。

⑧ 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⑨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出版社1983年版。

⑩ 谢敏聪:《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再研究(1403—1911)》,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要有平冈武夫的《长安与洛阳》^①等,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思路与方法。美国的都城制度虽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一样,但也出版了研究论文集《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②,书中收录了几篇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论文,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关于都城考古的研究资料比较丰富。考古工作者对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进行了全方位地、持续不断地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其中有统一王朝或帝国时期的都城遗址,如夏代都城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都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遗址、西周都城丰镐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和元大都遗址等,此外还有陕西周原遗址、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曹魏和北朝的邺城遗址、渤海上京遗址和南宋临安城遗址等。这些考古工作使对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不断深入。在考古资料中,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③是作者的考古学论文汇编,主要综述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对秦代都城与汉代都城遗址进行了论述,为本研究提供了考古学的都城研究方法及其秦代都城的具体资料。

以上论著,既有关于都城的宏观研究,又有具体的微观研究,解决了一些理论上、概念上的问题,为我们研究先秦多都并存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具体资料。

(二) 对古代都城制度尤其是多都并存制度的研究

都城制度是人类社会早期各种制度的一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乃至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许多特征的形成,都与都城制度的发展有关。王国维首先重视先秦制度研究^④,但未涉及都城制度。关于都城制度,论文方面,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⑤提出了都城制度问题,并且认为三代实行圣都俗都制度。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都

① [日] 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杨励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美]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③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 [美] 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城制度的研究。李自智^①、许顺湛^②、渠川福^③、程妮娜^④、万明^⑤、李令福^⑥、马世之^⑦等对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都城进行了有益的实证探索,杨宽^⑧、尹钧科^⑨、叶骁军、朱士光^⑩等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对多都并存制度进行了理论探讨,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方法上、思路上的帮助。其中,叶骁军、朱士光的《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是一篇有较高价值的论文,探讨了陪都制度的起源、多京制的形成与发展、陪都的类型地位和作用、陪都的地理位置等问题。李令福《周秦都邑比较研究》有意识地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看待都城的迁徙和都城的地位,是一种可取的尝试。吴长川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秦陪都功能初论》认为先秦时期的陪都具有军事、政治、祭祀三方面的功能,但复原、界定具体陪都的力度不够。

专著方面,目前较有影响的主要有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⑪和张国硕《夏商都城制度研究》^⑫。其中,杨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古代都城的方位朝向制度、城郭制度及城市形态结构等方面,未涉及多座都城所形成的都城体系研究。对本研究帮助最大的是张国硕的专著。张书从主辅都制度、离宫别馆、都城选址、都城军事防御、都城规划布局等五个角度深入研究了夏商都城。其中,主辅都制度和离宫别

① 李自智:《先秦陪都初论》,《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② 许顺湛:《中国最早的两京制——郑亳与西亳》,《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③ 渠川福:《我国古代陪都史上的特殊现象——东魏北齐别都晋阳略论》,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 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3期。

⑤ 万明:《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⑥ 李令福:《周秦都邑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⑦ 马世之:《关于楚之别都》,《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⑧ 杨宽:《商代的别都制度》,《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⑨ 尹钧科:《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及其在古都学研究中的地位》,《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古都学与城市历史地理学》,《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⑩ 叶骁军、朱士光:《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⑪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⑫ 张国硕:《夏商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馆制度及都城选址制度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多都并存这个重要问题。在多都并存制度的研究方面，张书做了一定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很大突破。第一，张书首次提出夏商都城并非“屡迁”，而是实行“主辅都制度”，并对此制度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第二，张书认为离宫别馆实际上是辅都的一种形式，虽然这种提法可能有待商榷，但对我们提出确立辅都（即陪都）的条件有一定的启发。第三，张书明确提出了“主都居中制度”和“辅都在边制度”，结合先秦时期出现的“择中建都”原则，我们可以看出，张书已经初步具有了空间权衡的概念，从政权疆域不同空间的角度来思考主都与陪都的都城设置与都城职能。但是，由于多都并存制度只是都城制度的一个方面，张书对涉及的多都并存制度并没有深入研究，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没有正确解释主都与陪都之间深刻的差异所在，换句话说，没有明确指出主都和陪都应该具有的特点与条件及主都与陪都之间的差异性，因此，就无法具体解释为什么阳城为大禹时的主都而斟鄩为夏王朝时期的主都，为什么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主都而安阳殷墟为商王朝后期的主都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著者只是泛泛空谈这些主都“规模大、规格高、延续时间长”。其实，都城“规模大、规格高、延续时间长”只是主都相对于陪都的重要特点，笔者认为，这些描述不能科学地确定一个都城的主都地位，更不能论述主都地位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的过程。

二 本研究试图关注的视角

综观上述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述，可以看到，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笔者认为，以先秦多都并存制度为研究论题，在对先秦时期实证案例的分析基础上，进行规律与特点的探讨和总结，是需要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研究可能需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多都并存有关的概念及多都并存含义的界定

研究先秦的多都并存制度，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城、城市、都城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城市的起源、都城的起源问题等。其次，目前学术界在进行研究时，使用多个类似的概念描述同时并存的多个都城，这

些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主都、首都、陪都、辅都、行都、别都、圣都、俗都等。多个概念的使用，容易导致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模糊与混乱。因此，在研究多都并存制度的开始，我们需要对各个概念作一个简要的界定，以保证在本研究中不会出现歧义或混淆。最后，对“多都并存制度”的界定。“多都并存制度”一词是本研究率先提出的，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的用“主辅都制度”一词，有的用“陪都制度”或“别都制度”的说法，侧重点不同，其内涵也不一样。同时，有些学者对先秦时期的多都并存现象能否成为制度还存有怀疑，因此，本研究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还要对“多都并存制度”一词的含义进行界定和说明，并论证“多都并存制度”的存在。

（二）先秦多都并存实证案例研究

为了对先秦时期多都并存现象有一个完整而深入的了解，进而分析多都并存制度的产生、确定及发展流变的过程，论证多都并存制度形成的原因，探讨先秦多都并存制度对后世的影响，需要复原研究先秦时期多都并存的实证案例。

因此，本研究用九章的篇幅着重复原研究先秦各个时期的多都并存案例并探讨具体政权多都并存的规律，包括：推测夏代多都并存的都城体系。研究商代都城迁徙和多都并存制度，在早商时期，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二都并存的关系，其中郑州商城是主都，偃师商城作为陪都存在；在中商时期，圣都在“商”而隰、相、邢、奄等俗都屡迁；在晚商时期，殷墟为主都，“成汤之故居”为陪都，朝歌为重要政治中心（是否为陪都尚不确定）。梳理西周时期岐周、宗周、成周三都的设置及其关系，得出结论：岐周为西周政权的圣都，宗周为主都，成周为陪都。理清晋国初期“翼”与“绛”的同地异名关系，确定晋国曲沃的圣都地位和绛的主都地位。确定秦国都城的设置情况是并存中有迁徙，秦国圣都有两座，主都即俗都，是前线都城，俗都不断迁徙，最后定都于咸阳。楚国的陪都主要是在军事要塞设置，是军事性都城。齐国实行五都制，除主都临淄外，其余四都均为边疆地区的军事要塞。燕国也建立有军事性陪都。战国时期，存在着以赵魏韩等国为代表的都城制度的异变，表现形式为“一都独大”。

（三）多都并存制度的发展与流变

在上述关于多都并存制度研究的论著中，对于多都并存制度的起始

时代的问题，分歧颇大。李自智从分析考古资料入手，有保留地认为“先秦时期陪都已经形成”。张光直认为，从夏代开始就存在多都并存制度。杨宽认为，“别都制度”“可以追溯到商代”。史念海先生认为，陪都制度的建立年代，始于西周初年，即雒邑的建立是陪都制度形成的标志。

制度的确立有其过程性，也就是说，制度有一个逐步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多都并存制度的渊源在哪里？如何确定其起始年代？这应该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多都并存制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起始状态下的多都并存制度有一种什么样的表现？起始状态下的多都并存制度与后世的多都并存制度相比有什么差异？诸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

钱穆先生认为，制度有一个确定的过程，而一经确定，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发展特征，甚至在不同的地域也可能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关于多都并存制度的发展流变研究，有赖于对多都并存制度进行一定数量的典型实证研究，复原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王朝或政权的多个都城设置状况，再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王朝或政权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在做实证研究之前，首先应该确定提出实证研究案例的依据和原则，并保证这些依据和原则普遍适用于每一个实证案例。本研究第十一章在先秦多都并存制度案例复原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多都并存制度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发展与流变以及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找出其阶段性和差异性，对多都并存制度的发展与流变得出自己的认识：从多都并存制度的表现形式来看，先秦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可以划分为滥觞（夏商时期）、确立（西周时期）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阶段，在春秋战国时期，多都并存制度呈现出空间分异的特点。

（四）多都并存制度形成的原因分析

关于多都并存制度的形成原因，张国硕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是影响夏商时代“主辅都都城制度”存在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客观原因包括“夏商王朝地域辽阔”和“交通不便”两个方面，主观原因则包括“力图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和“军事战争的需要”两个方面。可以说，张国硕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李自智《先秦陪都初论》^①则在论述先秦的三个陪都偃师商城、西

^① 李自智：《先秦陪都初论》，《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